

一 佛教东传

(一) 佛

佛是人，而不是神。他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人，有名有姓，他的名字是悉达多，姓乔达摩。因为他属于释迦（sakya）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义为释迦族的圣人。“佛”是“佛陀”的简称，是 Buddha 的音译，义为“觉者”或“智者”。当然，到了后来佛陀被人们神化了，但是根据佛教教义，佛不是造物主，他虽有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却不能主宰人的吉凶祸福。佛教还认为过去有人成佛，未来也会有人成佛，一切人都有觉悟的可能性，所以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得成佛”。

释迦牟尼，古代印度迦毗罗卫城（今尼泊尔南境）净饭王的儿子。他的生卒年代说法不一，较为可信的说法是，约生于公元前 566—前 563 年之间，卒于公元前 486—前 483 年之间。据佛经记载，摩耶回娘家时，经蓝毗尼园（今尼泊尔南部鲁潘德希县）生

释迦牟尼，七日后即逝世。姨母大爱道将释迦牟尼抚养成人。他 16 岁时（一说 19 岁），娶妻耶稣陀罗，29 岁得子罗怙罗。据说他因看到老、病、死、比丘四种现象，痛感人生之苦，为寻求解脱之路而弃世出家。他首先向两位婆罗门学者求教，未获真谛；又自行苦修六年，骨瘦如柴，也未得道。最后他放弃了苦修，在菩提伽耶（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的一株菩提树下冥思苦想七七四十九天（一说七天），终于大彻大悟，得道成佛。是年 35 岁。得道后决心弘法，他首先到波罗奈城鹿野苑（今印度瓦腊纳西城西北）第一次讲道，度桥陈如等五比丘为僧人，这就是“初转法轮”。

此后的四十五年中，释迦牟尼以摩揭陀的王舍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底赖雅附近）居萨罗的舍卫城（今印度西北拉普地河南岸）、跋祇的吠舍离（今印度比哈尔邦）、迦尸的波罗奈、末罗的拘尸那以及他的家乡迦毗罗卫等地为中心传教，当时的鹿野苑、竹林精舍（在王舍城）和祇树给孤独园（在舍卫城），成为释迦牟尼安居和讲道的三大圣地。释迦牟尼度化大迦叶、舍利弗、目犍连、阿难陀和优波离等大弟子，形成以一定戒律为维系的僧团。他 80 岁时在拘尸那城郊的双树涅槃。遗体火化后，舍利（佛骨）各国均分，建塔供养。他的言行说教经其弟子数次诵记整理，成为经、律、论三藏。他所创立的佛教在流传过

程中，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二）佛教

佛教，广义地说，是一种宗教，包括相应的经典、教法、仪式、制度、习惯、教团组织等；狭义地说，它就是佛所说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的术语来说，应当叫做“佛法”。佛法的基本内容可以用四圣谛来概括（谛的意思是真理）：苦谛，告诉人们现实生活充满了种种的痛苦，主要有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和不爱的东西会合的痛苦）爱别离苦（和可爱的东西别离的痛苦）求不得苦和五取蕴苦（一切身心的痛苦）；因谛（或集谛），指产生痛苦的原因；灭谛，指痛苦的消灭，即理想是无苦的涅槃境界；道谛，指灭苦的方法或实现理想的道路，这种道路有八种，即正见、正思或正志（正确的意志）正语、正业（正确的行为）正命（正确的生活）正精进（正确的努力）正念（正确的思想意识）正定（正确的精神集中），佛经所说的道理非常多，究其实都是围绕四圣谛展开讨论的。

四圣谛的哲学基础则是缘起说。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也就是说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生起，都是相待（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决定的；离

开关系和条件，就不能生起任何一个事物和现象。因缘一般地解释，就是关系和条件。所谓“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即是说的这个道理。而“法”则是指宇宙万有，佛教认为它可以分成五类，称之为“五蕴”，即色蕴（物质现象）、受蕴（感觉）、想蕴（知觉或表象作用）、行蕴（意志）、识蕴（意识或认识作用）。在色蕴中包括着四大（地、水、风、火）和四大组成的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以及感觉的对象（色、声、香、味、触）。这五蕴在相互集合中构成了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

原始佛教用缘起说观察人生，把人生分为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等 12 个彼此互为条件或因果联系的环节，认为“无明（无知）引起了“行（意志）；由“行”引起了精神统一体的“识”；由“识”引起了“名”（精神）和色（肉体）；有了“名色”就有了“六入”，即眼、耳、鼻、舌、身、意（心）等 6 种感觉器官；有了“六入”也就引起“触”，即对外界事物的接触；由“触”引起“受”（感觉）；由“受”引起了“爱”（贪爱）；有了“爱”就有了“取”，即对外界事物的追求索取；由“取”引起了“有”，即生存的环境；有了“有”就有了“生”；有了“生”也就有“老死”。十二因缘的中心内容是：人生的痛苦是由无知引起的，只有消除了无知才能获得解脱。后来小乘佛

教把十二因缘与轮回说教结合起来提出所谓“三世两重因果说”。

佛教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公元前 6 世纪中叶到前 4 世纪中叶，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子传承其教义，为原始佛教；公元前 4 世纪中叶起，佛教内部对戒律和某些教义的理解发生了分歧，分裂为许多教团，后称为八部或二十部，为部派佛教；公元 1 世纪左右出现了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为了抬高自己，把以前的佛教贬称为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先有“中观学派”，后有“瑜伽行派”；7 世纪以后，大乘一部分派别同婆罗门教混合，形成密教。13 世纪初，由于政治原因，佛教在印度本土趋于消失，19 世纪以后又稍有复兴。

（三）佛教徒

传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成佛以后，便开始收徒，并建立僧团。最初受三归（即归依三宝：佛、法、僧）成为佛教徒的是两个商人，一个叫多婆富沙，一个叫婆利迦，他们是佛陀最初的一对在家弟子。不久，佛陀向曾经陪伴他修行的侨陈如、额鞞跋提、十力迦叶、摩男俱利五人说法（佛教徒称之为初转法轮），并为他们剃发，于是侨陈如等五人就成为佛教最早的出家弟子。据佛经说，由于他们刻苦的

修行，很快就证得了阿罗汉果，所以他们又是佛教最早的一批“罗汉”。释迦牟尼逝世后，僧俗佛弟子继承他的遗志，发展教徒，弘扬佛法，使佛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由于师徒传承不断，佛教徒均尊奉释迦牟尼为本师，而自称为佛陀的弟子。佛教徒有四众之分，四众指的是出家男女二众和在家男女二众。出家的男性名为“比丘”，女性名为“比丘尼”。比丘是梵语（印度古典语），义即乞食（出于修行、传教等原因，比丘遵行托钵乞食制），又有破恶、净命等义。尼是梵语中女声。俗称比丘为“僧人”。僧是梵语“僧迦”之略，义为众，凡三比丘以上共处即称为众（僧迦）。出家制度并不是佛教所特有的，印度古代各教派都有出家的规定。其出家者统称为“沙门”，义为止息一切恶行。印度其他教派既未传入中国，于是“沙门”也就成为出家佛教徒的专用名称了。比丘也俗称为“和尚”。西域（今新疆一带）泛称博士为和阗；“和尚”即是和阗的音译。若依梵文典语应作“邬波驮耶”，义为亲教师，与习俗所称师傅相同（有些人误以为“和尚”即和气高尚的意思，其实是望文生义的臆说）。其中比丘、沙门二词多用于文字；僧人、和尚多用于口语。至于彼此称呼，对一般僧人则称某某师，对上层人士称某某法师，对寺院住持称某某和尚。蒙藏地区称僧人为喇嘛，相当于汉族地区所称和

尚，也是师傅的意思。俗称比丘尼为“尼姑”，尼是比丘尼之略，姑是汉语，这种称呼是不见于经论的。

在家男众称为“优婆塞”，在家女众称为“优婆夷”。优婆塞是梵语，义为清洁士，又作近事男，表示他们是亲近奉事三宝的。优婆夷义为清信女或近事女。俗称在家佛教徒为“居士”，这是梵语“迦罗越”的义译，原指多财富乐的人士，转而为居家修道之士的称呼。

在家人信仰佛教，愿意成为正式的在家佛教徒——优婆塞、优婆夷，要经过一定的手续。在家佛教徒的基本条件是受持三归，就是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归依是投靠的意思，言其以自己的身心性命投靠于佛法僧，依佛法僧的教导行持。受持三归须请一位法师依照《三归仪轨》为自己说明三归的意义，自己表示今后尽形寿归依三宝，这样就成为优婆塞、优婆夷了。同日或过若干日以后，可以从师受不杀生、不盗窃、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戒。受五戒后，还可以按照“菩萨戒仪轨”从师受在家菩萨戒（共有十条重戒、二十八条轻戒），自己表示一一遵守，即成为菩萨戒优婆塞、优婆夷。

佛教信徒愿求出离家庭、独身修道，手续要复杂一些。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中国从汉唐到现在，由于地理和时代的不同，出家的程序各有所不同。按照佛教戒律规定，佛教信徒要求出家，可以到寺院中向

一位比丘请求作为自己的“依止师”。这位比丘要向全寺僧侣说明情由，征求全体意见，取得一致同意后，方可收留此人为弟子，为之剃除须发，并为之授沙弥戒（沙弥戒有十条）此人便成为“沙弥”。沙弥是梵语，义为勤策男，言其当勤受比丘之策励，又有息慈之义，表示沙弥息恶行慈。沙弥最小的年龄是七岁。依止师对弟子负有教育和赡养的责任。俟其年满20岁时，经过僧侣的同意，召集十位大德长老，共同为之授比丘戒（比丘戒有二百五十条），此人便成为比丘。受比丘戒满五年后，方可以离开依止师，自己单独修道。至于女子出家，同样要先依止一位比丘尼，受沙弥尼戒（沙弥尼戒也是十条），至年满18岁时，受式叉摩罗戒（有六条戒），成为“式叉摩罗尼”，义为学法女。经两年后，至年满20岁，须先从比丘尼，后从比丘受比丘尼戒（比丘尼戒有三百四十条）此人便成为“比丘尼”这叫做二部受戒。

至于比丘受戒以后，又厌倦出家的清苦生活，愿意还俗，是极其容易的，只要对任何人声明，自己愿意舍戒，便可以放弃比丘身份，改变独身的生活。受五戒的在家居士也可以根据自愿，随时对任何人声明，放弃优婆塞、优婆夷身份。

(四) 初入中国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所走路线有两条：一条是陆路，经由中亚细亚进入我国新疆地区，再深入内地；另一条是海路，经由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广州，即通过南海路线进入中国内地。自从汉武帝经营西域以来，陆路便成为东西交通的要道，商业贸易、使节往来十分频繁。这条陆路包括南北两道。南道是指由敦煌越过沙漠，经鄯善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昆仑山北麓，到达于阗（今和田），再向西北前进到莎车。北道是指由敦煌北上到伊吾（今哈密）经由吐鲁番到龟兹（今库车）然后再到达疏勒（今喀什市一带）。东汉时来中国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讖就是以这南北两道为通道的。印度来华的僧人大多通过这南北两道到达内地，走海路的较少，可能是由于海路开辟比陆路晚一些的缘故。史载在南北朝时才有著名的译经大师从海路来中国传播佛教。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内地的准确年代，历史上说法不一，且多属想象臆断，今已很难稽考。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说法：一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说。谓明帝在位时，曾派人赴西域访求佛道，在大月氏国遇着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遂邀请他们来汉，并用白马驮着佛像经卷共还洛阳。明帝又建白马寺供两位僧人

居住。这是在古代佛教徒中流传最广的佛教初传的史话。二是西汉哀帝时传入说。这种说法的主要根据是《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东夷传》裴松之注引曹魏鱼豢撰的《魏略·西戎传》，传中有“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载。以上两说，年代相差约七十年，间隔尚近。如果综合这两种说法，则佛教初传当在两汉之际，约公元 1 世纪左右。

（五）接受探论

佛教是一种域外的舶来品，和中国各相关方面的要素并不一致：语言不同，梵文跟汉语毫无共同之处；社会问题不同，佛教僧伽与家庭关系淡薄，而中国人则重视家庭和孝道；哲学不同，佛教徒承认羯摩（业）及生死轮回，而中国人除祖宗传统之外对来世则无甚兴趣；政治态度不同，僧伽是置身于政治和社会之外的超然阶层，而中国各种土著宗教则试图缓和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局势。另外中国向来对入侵的东西没有好感，这就给接受佛教文化带来巨大的困难，但佛教最终在华土生根，还是有内在原因的。

首先，佛教文化对当时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发展有利。佛教初传入中国之时，汉朝帝国逐步瓦解，旧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社会处于一种风雨飘摇之中。佛

教传进来的，第一是和尚，第二是寺庙。这时正当印度佛像艺术开始大发展之时（公元初），同时传入的就有佛像和经文。中国社会随之出现了原来没有的一种社会成分——寺庙经济，它破坏了原有的结构。更明显的是，佛教还起一种组织群众的作用，可以从物质上和精神上组织很多人在自己周围，这对于少数民族巩固自己的社会结构有利，因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可以各自加以利用。这种文化随少数民族传到中原，在民族杂居而经济和政治结构复杂变化的历史条件下，佛教作用胜过了原有的儒家文化。稍一检查石窟造像的题名，就可以看出它实际上起了组织跨行会的人的作用。当“会首”的是组织者，寺庙是集中聚会地，佛像是核心的象征，香火是联络的信号。这种社会力量一旦形成，就不能不为统治者（尤其是弱族而要成为大国的王者）所重视，一切宗教行为都是围绕这一寺庙文化进行的仪式。

其次，佛教某些思想观念的灵活性逐步适应了中国的文化形态。佛教在汉代传入后，先是依附于道术；到魏晋时期由于玄学的流行，而又依附于玄学。汉朝时，佛教重要的信条是“灵魂不入死”、“因果报应”，这些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本有的或者至少说是有相近的，且佛教所传小乘禅法又和中国黄老神仙家的呼吸吐纳大体相同。到魏晋时期，玄学流行，般若空宗和玄学有些相似，所以它可以依附玄学而流

行。从具体观念看，如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等与中国本土文化资源都有相洽之处。佛教既可以承认“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因为有前定的因，又可以肯定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因为既有前定的未知的因决定，又有今世种下来世的因的可能。人们可以拜佛求来世，也可以伪托弥勒佛降生而造反。佛教是戒杀的，但不排除降魔。中国庙一进“山门”便是“四大金刚（天王）”横眉怒目，殿上笑嘻嘻的菩萨背后是手举降魔杵的“护法”韦驮。

最后，佛教文化的中国化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佛教的传播是与佛教的经典译介同步进行的。佛典只有译成汉文才能被汉人阅读和接受。此时来华的僧人都十分重视译经工作，为佛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据史载，东汉末年的佛典翻译事业开始于安世高。安世高是从安息（今伊朗高原东北部）来的精通阿毘昙学和禅学的学者，他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和《小十二门经》等大量经典，其中最主要的是禅经。另外，是从大月氏来的支娄迦谶（简称支谶），他译出了《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三昧经》等，主要的是《大乘般若经》和禅经。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并称汉代两大译师。此外来华的还有竺佛朔、安玄、支曜和康孟祥等，他们也各有传译。当然佛教哲学传到了中国还是有了变化，原来不着重讨论

的,如“涅槃”、“佛性”等等解说,却在汉族哲学史中成了变幻莫测的论题。佛教是乐生而不是寻死,它以戒杀为法,否认变化现象的永恒真实,同时肯定复杂现象的感觉真实。在中国,这一个模式在知识分子书中讲来讲去,实际上在信教者的实践中不成问题。连佛陀都有生老病死,一切照常。坐禅的人必须大吃大喝,否则不能在一炷香接一炷香的长时间内练功。至于真实,那是指“涅槃”,是另一回事。巴利语《长阿含经》中,佛陀否认他说过世界是丑的,只承认得“涅槃”者才知道美,因为真即美,美即真。这些关键词或关键概念的意义,汉族知识分子在自己思想的“上下文”和“句法”的模式中作了自己的理解,一般人在实践中却没有弄错原义。

(六) 从徐州到泰山

佛教在山东地区的传播,大致开始于东汉末年。据《三国志·刘繇传》记载:作为徐州牧陶谦部下的运漕官笮融,曾“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

计”。这是我国东部地区民间建寺造像、传播佛教的较早记载。陶谦做徐州牧在初平四年（193），笮融死于兴平二年（195），则这事大致发生在公元193—195年之间。当时的徐州，包括了今山东东南部的枣庄、临沂地区，据此，可以认为，在今山东的东南部，当时人们已和佛教有了接触。

魏晋时期，佛教在山东仍处于始传阶段，有史可考的山东籍僧人仅有二人，一个叫竺潜，一个叫道宝，都是在西晋末年出家的。竺潜（286—374），亦名竺道潜，字法深。《高僧传》说他是琅邪大族王敦之弟，18岁出家，师从西晋清谈名士中州刘元真，成为西晋末年青年名僧，是当时佛教大乘中观宗《般若经》学说六家七宗的代表人物之一。十六国东晋时期，山东佛教的传播以泰山为中心，主要集中在西北部的清河（今山东临清）、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中部的泰山、济南、临淄、青州，南部的任城（今山东微山西北）、金乡（今山东嘉祥南）、高平（今山东邹城西南）、东莞（今山东沂水）和东部的牢山（今山东崂山）等地区。除了从佛教中心长安来的高僧外，山东本地的僧徒也显著增多，他们大多是佛教大师佛图澄、鸠摩罗什的弟子。由于战乱，一部分山东僧徒南渡，成为江南有影响的名僧，一部分则仍坚持在当地传法。

二 儒佛接触（魏晋南北朝）

（一）名僧踪迹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山东地区的传播，许多传法的高僧留下了他们的踪迹。在山东本土建寺传法的高僧中，影响最大的是竺僧朗，亦称朗公。僧朗，京兆人，佛图澄的弟子。佛图澄，本姓帛，古印度人，西晋时来到洛阳，后以神通之术见信于石勒、石虎。他以佛教因果报应教义为石氏政权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华的合理性制造理论根据，由此为后赵政权尊崇，称“大和上”，被誉为“国之大宝”，参与军国大事，成为后赵政权的精神支柱。由于佛图澄及其弟子们的努力，佛教在中国北方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僧朗是佛图澄著名弟子之一，他在泰山金舆谷领导僧团修习“戒德冰霜，学徒清秀”，得到普遍的尊重，泰山由此成为当时著名的佛教中心。苻坚统治时期沙汰众僧，特意下诏，僧朗僧团不属沙汰之列。前秦苻坚皇始元年（351），僧朗为逃避冉闵之乱迁居泰

山。他在泰山西北的金舆昆仑山清除了虎患，创建朗公寺，讲解《放光般若经》，传授弟子百余人。

僧朗博学硕通，在当时的佛教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南燕主慕容德授予僧朗东齐王的称号，并赐予奉高、山在两县的封禄，以师事之。前秦主苻坚“送紫金数斤，绢绫三十匹，奴子三人，以备洒扫”。不仅赠物，而且赠送奴隶！

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即使在戎马倥偬之际，也要敬问“泰山朗和上”，要僧朗帮助他稳定离王畿最远的地方。此外，后秦主姚兴、东晋孝武帝都和泰山僧朗有过书信往来并以厚礼馈赠。对于统治者的馈赠和来书，僧朗都有回复，他在回复慕容德的信中说：“僧朗顿首！陛下龙飞统御百国……荡平之期，何忧不一！”（《广弘明集》卷35）佛教主张出世，僧朗的所作所为显然是为适应社会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给佛教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当时一些名僧也经常往来于泰山一带，高僧道安就是突出的一个。道安，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境）人，俗姓卫。他本是读书人家，但由于父母双亡，12岁时出家为僧，长相又黑又丑，但聪颖异常，后师事佛图澄。他对佛经的翻译工作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为佛教寺院定立规制，划一僧人的姓氏。道安以后，僧尼一律姓“释”，这些在中国佛教史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道安翻译的佛典《鬼子母

经》中，有“死后亦入泰山地狱”之语。大约在前秦苻坚建元十六、十七年（380—381），道安来到泰山，参加金輿谷之会，他的这次东下，可能是应僧朗的邀请。

法显，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襄汾）人。兄弟四人，三人都在幼年时死去。父母担心他也夭折，3岁时便度为沙弥。20岁时受具足戒，正式出家。他志行明敏，仪轨整肃。经常感慨传译的经本，尤其是戒律不全，使得中国佛教的教团生活缺少遵循，立志要到印度去求访经典。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法显约了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一起从长安出发。历经千年辛万苦，元兴元年（402）到达印度，在印度他四处游历，寻访抄写中国没有的经本。后又经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义熙八年（412）回到中国，在青州长广郡（今山东即墨境）登陆，居停一年，第二年才去建康（今南京）。这样，西行求法的高僧法显在山东留下了踪迹。

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法定来到泰山西北的方山开山，重修寺院，在方山之阴，为神宝寺。后又迁至方山之阳，为灵岩寺，法定被誉为开山第一祖。经过许多名僧的努力，佛教在山东逐渐扎下根来，进入一个稳步发展的时期。